

文化基因视域下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转型困境与治理路径

张炜琼¹

(1.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大邱 38541)

摘要: 文化基因理论为解析家庭教育的代际传递机制与深层文化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立足文化演化与文化传递的理论框架,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制度背景, 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化脉络, 剖析当代家庭教育领域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的内在张力及其生成机制。研究发现, 当代家庭教育文化基因呈现传统德性内核延续与功利化表层异化的双重特征, 社会阶层分化、数字媒介迭代与教育制度转型共同塑造了文化基因的选择性传递路径, 进而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的代际再生产。基于此, 本文从制度保障、协同育人、数字赋能、公平补偿四个维度提出文化敏感型家庭教育治理路径, 为推动家庭教育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文化基因; 家庭教育; 代际传递; 教育治理; 文化演化

DOI: doi.org/10.70693/202606222415

Transformational Dilemmas and Governance Pathway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A Cultural Meme Perspective

Zhang Weiqiong¹

¹ Yeungnam University, 38541, Republic of Korea Daegu

Abstract: Cultural meme theory offers a rigorous analytical lens for unpa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underlying cultural logics of family educ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situated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 backdrop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cultural memes in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and interrogates the inherent tension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between long-stand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ongoing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ultural mem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present distinct dual characteristics: the enduring core of traditional virtue ethics remains deeply embedded in family parenting logics, while a utilitarian-driven superficial alienation has emerged amid intensified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terative upgrading of digital media,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jointly shape the selective transmission pathways of cultural memes, which in turn exacerb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Building on these insigh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ulturally sensitive governance pathways for family education across four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equity compensation. These pathways provide theoretically grounded references and actionable solution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作者简介: 张炜琼(1995—),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比较教育、东亚教育。

通讯作者: 张炜琼

Keywords: Cultural Meme; Family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ducational Governance; Cultural Evolution

一、问题提出

家庭是文化传承与人格养成的初始场域，家庭教育作为家庭对未成年人开展的道德培育、知识传授与身心养护实践，既承载着民族文化代际延续的功能，也是社会分层再生产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变迁：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家庭教育从传统私域事务转向国家治理范畴，家庭教育的法治化、公共化程度持续提升[1]；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分化、数字技术普及与教育竞争加剧，使得家庭教育的观念、实践与资源配置呈现出复杂的张力，教育焦虑泛化、代际沟通障碍、阶层差异扩大等问题日益凸显[2]。

既有研究对家庭教育的探讨主要形成三条脉络：其一，政策与法治视角，聚焦《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逻辑、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分析政府、学校、家庭的权责边界，为家庭教育治理提供制度层面的建议[3][4]；其二，社会学视角，借助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分析不同阶层家庭教育投入、教养观念的差异，探讨家庭教育在代际不平等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5]；其三，文化与历史视角，梳理中国家庭教育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变迁，分析儒家伦理对家庭教育的深层影响[6]。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结构或制度层面展开，对家庭内部文化传递的微观机制探讨不足，尤其缺乏将文化传承、制度变迁与个体行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系统性研究。

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又称模因 Meme）理论以文化传递的基本单元为核心分析对象，借鉴生物演化的逻辑解释文化的复制、变异与选择过程，为解析家庭教育的微观文化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7]。自道金斯提出“模因”概念以来，文化演化研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量化分析框架，将文化传递划分为纵向代际传递、横向同辈传递与斜向跨代传递等模式，为解释文化特征的延续与变迁提供了方法论基础[8]。国内已有研究开始将文化基因理论引入教育领域，但多聚焦于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针对家庭教育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匮乏[9]。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文化基因理论引入家庭教育研究，构建“文化单元—传递机制—制度选

择”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中国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化脉络，剖析当代家庭教育的文化困境与深层生成机制，最终提出适配新时代要求的家庭教育治理路径。本研究既有助于丰富教育社会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也能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落地实施、提升家庭教育治理效能提供实践参考。

二、理论视角：文化基因的内涵及其家庭教育分析维度

（一）文化基因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演进

“文化基因”的概念源于生物遗传学的隐喻。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模因”（Meme）概念，将其定义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认为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文化单元可以通过模仿实现代际与群体间的复制，其演化逻辑与基因的遗传、变异、选择具有相似性[10]。后续学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卡瓦利-斯福扎与费尔德曼构建了文化传递的量化模型，系统区分了纵向（父母向子女）、横向（同辈之间）、斜向（非亲属长辈向晚辈）三种传递模式，揭示了不同传递模式对文化演化的差异化影响[8]；博伊德与里彻森则将文化演化与社会制度、群体心理结合，提出了双重继承理论，指出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共同塑造了人类的行为模式[11]。

与生物基因相比，文化基因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其一，传递的可塑性，文化基因并非被动复制，而是在传递过程中会被承载者主动选择、重构与变异；其二，影响的层级性，文化基因既可以通过微观亲子互动实现代际传递，也会受到宏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选择与塑造；其三，作用的隐性化，多数文化基因并非通过显性说教传递，而是嵌入日常行为、仪式规范与价值观念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传承。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基因理论逐步被引入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为解析教育中的文化传承、观念变迁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9]。

（二）家庭教育的文化基因分析框架

家庭教育是文化基因纵向传递的核心场域。家庭中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仪式等文化单元，通过亲子互动实现代际复制与重构，构成了家庭教育的文化基因系统。结合既有研究与中

国家家庭教育的实践特征, 本文将家庭教育文化基因划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其一, 价值观念基因, 是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内核, 指家庭秉持的教育目标、价值排序与伦理观念, 如“德行为先”“学而优则仕”“望子成龙”等价值取向, 决定了家庭教育的根本方向;

其二, 行为规范基因, 是价值观念的外化体现, 指家庭教育中的互动模式、教养方式、奖惩规则等行为范式, 如权威型教养、民主型沟通、“严父慈母”的角色分工等, 直接塑造了子女的行为习惯与人格特征;

其三, 符号仪式基因, 是文化基因的具象载体, 指家庭中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仪式、符号与实践活 动, 如家训家风、节日礼仪、亲子共读、学习仪式等, 通过具象化的活动实现文化的隐性传递。

三个维度层层嵌套, 共同构成了家庭教育文化基因型。其传递机制以纵向代际传递为主, 同时受到横向社会环境、斜向制度政策的影响。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社会结构、技术环境构成了文化基因的选择压力, 决定了哪些文化基因会被保留、强化, 哪些会被弱化、淘汰。下文将基于这一分析框架, 梳理中国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历史演化脉络, 剖析当代的现实困境与生成机制。

三、历史演化: 中国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变迁脉络

中国家庭教育文化基因植根于儒家伦理传统, 在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多次转型, 其演化过程始终与社会结构、教育制度的变迁同频。根据核心特征的差异, 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 传统宗法社会: “家训型”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固化

先秦至晚清的传统宗法社会中, 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得家庭教育兼具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双重功能[12]。这一阶段的家庭教育文化基因以儒家伦理为核心, 形成了系统的“家训型”文化: 价值层面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目标, 强调“德本才末”“忠孝一体”, 将道德修养置于教育的首要位置; 行为层面形成了“父为子纲”“严父慈母”的权威型教养模式, 以家规家训为行为准则; 符号层面则形成了族谱、家训、家祭等系统化的文化仪式, 保障文化基因的稳定传递。

传统“家训型”文化基因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路径依赖性,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经典文本成为跨代传递的文化编码, 使得儒家伦理深度嵌入家庭教育的微观实践中[13]。这一阶段的文化基因传递以家族为单位, 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阶层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资本的占有量上, 核心价值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

(二) 近代转型期: “重构型”文化基因的震荡与调适

晚清至改革开放前, 随着西学东渐、科举制废除与现代学校制度建立, 传统家庭教育文化根基受到冲击, 进入“重构型”转型阶段。一方面, 传统宗法制度逐步瓦解, 家庭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弱化, 学校教育逐步取代家族教育成为知识传递的主渠道, 家庭教育的内容从系统的伦理教化转向日常的品格养成与学业辅助[14]; 另一方面, 民主、平等、科学等现代观念逐步传入家庭, 传统权威型教养模式受到冲击, 亲子关系趋向平等化。

这一阶段的文化基因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 传统德性教育的内核仍在多数家庭中延续, 但形式逐步弱化; 现代教育观念开始从城市向农村扩散, 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基因体系。社会动荡与制度变迁使得文化基因的传递缺乏稳定的制度支撑, 呈现出较强的震荡性与地域性差异。

(三) 改革开放后: “功利型”文化基因的生成与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教育选拔功能强化, 使得家庭教育文化基因逐步向“功利型”转型。随着高考制度恢复与教育筛选功能的强化, 教育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核心渠道, “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成为社会共识[15]。在这一背景下, 家庭教育的价值排序发生了显著变化: 学业成绩的权重持续上升, “绩优导向”逐步超越“德性优先”成为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标; 行为层面, 家庭的教育投入持续增加, “鸡娃”“陪读”等现象逐步普及, 教育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符号层面, 传统家训仪式逐步弱化, 课外补习、学区房、升学规划等成为家庭教育新的符号载体。

这一阶段的文化基因变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深度绑定, 教育的工具价值被不断放大, 而人文与德性价值被相对弱化。同时, 阶层分化使得不同家庭的文化基因差异逐步扩大, 优势阶层能够通过更多的资源投入实现教育优势的代际传

递,而弱势家庭则面临文化资本匮乏的困境[16]。

(四)新时代:“制度型”文化基因的建构与转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确立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文化基因进入“制度型”建构阶段。国家通过立法与政策引导,重新明确家庭教育的德育属性,强调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推动家庭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家庭教育,从制度层面为文化基因的传承与优化提供了保障[17]。

与此同时,“双减”政策的实施有效遏制了校外培训乱象,为家庭教育减负提质提供了制度支撑。这一阶段的文化基因呈现出制度引导下的重构特征:传统德性教育的价值被重新强调,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逐步普及,但功利化教育的惯性依然存在,制度引导与观念转型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张力。

四、现实张力:当代家庭教育文化困境与生成机制

当代中国家庭教育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私域与公域、本土与外来文化的交织碰撞中,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变异呈现出复杂的张力,衍生出一系列现实困境。

(一)价值冲突:德性传统与绩效导向的内在张力

传统家庭教育以“修身成人”为核心目标,德性养成是教育的首要任务;而现代社会的竞争逻辑则将教育的工具价值不断放大,学业成绩、升学前景成为多数家庭关注的核心,二者形成了深层的价值张力。《中国家庭教育发展报告(2022)》的调查数据显示,72.3%的受访家长仍将“品德修养”列为家庭教育的首要目标,体现了传统德性基因的延续性;但在实际教育实践中,有68.7%的家长表示会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投入子女的学业辅导,德性教育往往停留在观念层面,缺乏落地的实践路径[18]。

这种“知行不一”的价值分裂,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内核与表层的背离:深层的文化心理仍认同德性优先的传统,但在现实的教育竞争压力下,表层的行为选择不得不向绩效导向倾斜。这种价值张力不仅削弱了家庭教育的育人效果,也

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与心理冲突。

(二)代际断裂:文化语境错位与沟通机制失效

数字时代的文化迭代速度加快,代际之间的文化语境差异持续扩大,导致传统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出现断裂。一方面,亲子两代的成长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家长辈多成长于传统媒介环境,其文化基因带有较强的集体主义与权威导向;而数字原住民一代成长于互联网环境,接触的文化信息更加多元,个体意识、平等意识更强,二者的文化基因存在天然的语境差异[19]。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青少年表示与父母存在“沟通频率不高”,“沟通障碍”的核心矛盾在于价值观念、话语体系与行为逻辑的差异,本质上是代际文化基因的错位[20]。

另一方面,数字媒介改变了文化传递的路径:传统社会中家庭是文化传递的主渠道,而当下青少年获取文化信息的主渠道是互联网,家庭的文化影响力被稀释。算法推荐机制下的亚文化、碎片化信息不断塑造青少年的文化认知,而家长往往对这些文化内容缺乏了解,难以进行有效的引导与沟通,进一步加剧了代际的文化断裂。

(三)阶层分化:文化资本差异与代际不平等再生产

社会阶层分化使得不同家庭的文化基因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化资本的差异化传递成为教育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优势阶层家庭不仅拥有更丰厚的经济资本,还拥有更优质的文化资本,其家庭教育文化基因更契合学校教育的评价标准,能够通过文化熏陶、素养培育、规划引导等方式,将阶层优势传递给下一代[21]。已有实证研究显示,高学历家长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注重子女的综合素养培育与自主能力发展;而低学历家庭更倾向于权威型或放任型教养,对子女的教育规划能力相对不足,二者的文化基因差异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22]。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基因的阶层差异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适配不同阶层生存逻辑的文化选择。但在当前教育选拔体系下,优势阶层的文化基因更契合学校的评价标准,进而转化为教育成就优势,最终形成阶层的代际复制。这种文化层面的不平等,比经济资本的差异更具隐蔽性,也更难通过政策干预进行调节。

（四）媒介异化：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文化基因浅层化

数字媒介的普及重构了家庭教育文化环境，也带来了文化基因的浅层化、工具化异化。一方面，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成为家庭教育观念传播的重要渠道，算法推荐机制不断放大教育焦虑，“鸡娃”“内卷”等文化符号通过网络快速扩散，使得功利化教育的文化基因被不断强化，甚至出现异化[23]。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显示，短视频平台上家庭教育类作品存在大量带有焦虑营销倾向的内容，通过制造升学恐慌、阶层焦虑博取流量，扭曲了正常的家庭教育观念[24][25]。

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文化传递呈现碎片化、浅层化特征，传统文化基因中深度的伦理内涵与价值观念，难以通过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实现传承。家庭教育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具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深层的价值引领与人格培育，使得文化基因的内核不断弱化，表层的工具性内容不断膨胀。

五、优化路径：文化基因视域下家庭教育治理的完善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当代家庭教育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政策约束与资源供给层面，而应立足文化基因的演化逻辑，构建文化敏感型的治理体系，引导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良性演化，实现传统传承与现代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制度筑基：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引导文化基因的正向演化

制度是文化基因选择的核心调控机制，应通过完善家庭教育法治体系，为文化基因的正向演化提供制度支撑。首先，细化《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配套实施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学校、社会的家庭教育责任边界，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标准化体系，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转化为可落地的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强化家庭教育的德育属性[26]。其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家庭教育制度设计，推动家训家风、传统礼仪、修身文化等优秀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鼓励家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强化文化基因的德性内核。最后，建立家庭教育政策的文化影响评估机制，在出台教育政策时充分评估其对家庭教育文化的潜在影响，避免政策设计加剧教育焦虑与功利化倾向，保障家庭教育文化的健康演化。

（二）协同育人：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实现文化基因的系统传递

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传承与优化，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发力，构建一体化的文化育人体系。首先，强化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功能，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学校的常规工作，通过家长学校、亲子活动、教师家访等形式，向家长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引导家长平衡德性教育与学业教育的关系，实现学校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同频共振[27]。其次，发挥社区的文化载体功能，依托社区教育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平台，开展家风建设、亲子实践、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将文化基因的传递融入社区生活，弥补家庭文化资源的差异。最后，培育专业的家庭教育社会组织，支持社工机构、公益组织参与家庭教育服务，为不同需求的家庭提供差异化、精准化的指导服务[28]。

（三）数字赋能：优化数字文化生态，提升家庭的媒介素养

针对数字时代文化基因的异化风险，应通过数字治理与素养提升双向发力，构建良性的家庭教育数字生态。一方面，加强家庭教育数字内容的治理与供给，由教育部门牵头建设官方的家庭教育资源平台，整合优质的家庭教育课程、专家指导、实践方案等资源，为家长提供科学、权威的信息，对冲流量导向的焦虑营销内容[29]。同时，加强对网络平台家庭教育内容的监管，规范自媒体的教育内容传播，打击制造教育焦虑、虚假宣传等行为，净化数字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将媒介素养纳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提升家长与子女的媒介信息辨别能力，引导家长理性看待网络上的教育经验，避免盲目跟风“鸡娃”；同时培养青少年的数字素养，引导其正确处理网络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关系，实现数字时代文化基因的良性传承。

（四）公平补偿：建立弱势家庭文化资本支持机制，减缓代际固化

针对文化基因的阶层分化问题，应建立面向弱势家庭的文化资本补偿机制，缩小家庭教育的阶层差距，促进教育公平。首先，加大对农村、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公益讲座、上门指导、数字化资源推送等方式，为弱势家庭提供免费的家庭教育指导，弥补其文化资本的不足。其次，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家庭教育需求，建立针对

性的帮扶机制,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学业支持与亲情陪伴,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最后,在教育政策设计中充分考虑文化差异,推动学校评价体系多元化,改变单一的学业成绩评价标准,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多元的发展通道,从根源上弱化文化资本的阶层复制功能[30]。

六、结论与展望

文化基因理论为解析家庭教育的深层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教育的文化基因植根于儒家伦理传统,经历了“家训型—重构型—功利型—制度型”的历史演化过程;当代家庭教育呈现出价值冲突、代际断裂、阶层分化、媒介异化四重文化张力,本质上是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技术迭代共同作用下文化基因的适应性变异。破解当代家庭教育困境,不能仅依靠单一的政策约束,而应立足文化演化的内在逻辑,从制度保障、协同育人、数字赋能、公平补偿四个维度构建文化敏感型治理体系,引导家庭教育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研究以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为主,缺乏大样本的实证数据支撑,未来可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家庭的文化基因特征进行量化分析,进一步验证理论框架;其二,研究主要聚焦国内的文化演化,缺乏跨文化的比较分析,未来可拓展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跨国比较,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文化基因的演化差异。总体而言,文化基因视角为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为推动家庭教育现代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参考文献:

- [1]李健,薛二勇,张志萍.家庭教育法的立法议程、价值、原理与实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2-71.
- [2]邹强.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 [3]罗爽.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基本框架及其配套制度设计[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82-188.
- [4]叶强.论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及其立法规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9(1):32-38.
- [5]蔡玲.社会分层视野下中国家庭教育投入及其影响机制研究[D].武汉大学,2022.
- [6]张敏.我国古代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初探[D].华东师范大学,2009.
- [7]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7-22

[8]Cavalli-Sforza,L.L.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M].PRINCETON UNIV P R,1981.

[9]高书国.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的理论缺失与自信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9-17.

[10]赵艳,李妍.探析模因论视角下的中英文混用现象[J].学园(教育科研),2012,(11):20-21.

[11]Peter J. Richerson. 基因之外:文化如何改变人类演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12]辛治洋,戴红宇.家庭教育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定位[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6):34-41.

[13]刘春梅.历代家训与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12-114.

[14]南钢.我国家家庭教育的近代转型[D].西北师范大学,2001.

[15]王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教育政策研究[J].中华家教,2021,(6):18-25.

[16]姚佳胜,张慧琳,李颖芳.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10):16-22.

[17]边玉芳,张馨宇.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内涵、特征与构建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20-25.

[18]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家庭教育发展报告(202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19]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63-70.

[20]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福利会发展研究中心,吴晓刚等.中国家庭教育与儿童发展蓝皮书 2023[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

[21]曾晓东.家庭教育支出的阶层差异及其社会意义[J].教育学报,2008,(6):80-86.

[22]赵万霞.高学历家长家庭教育的特点及指导建议[J].学前教育研究,2004,(12):46-47.

[23]叶强,杨敬之.数字化时代的家庭教育新挑战及立法回应[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1):86-93.

[24]刘佳,高敏.短视频对家长家庭教育的影响与治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5):85-96.

[25]徐爱玉.抖音育儿类短视频对当下育儿焦虑的影响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3.

[26]杨雯清.《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基本权利功能理论的分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6):126-135.

[27]窦媛,乔东平.“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与实施策略[J].中国教育学报,2023,(1):34-39+74.

[28]杨茂庆,伍辉燕.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博弈困境与纾解[J].现代教育管理,2025,(3):31-42.

[29]何芳.数字化时代如何赋能家庭教育[J].家庭教育,2025,(7):4-11.

[30]张和平,张青根,尹霞.家庭资本、校外培训与教育机会公平[J].教育学术月刊,2021,(2):3-11.